

今年经济走势谨慎乐观

□杨明炜等

去年底今年初，人们曾普遍对今年的经济走势不抱太大信心，但上半年的实际情况却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在记者采访中，来自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信息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要好于去年的预期，但谈及全年经济走势，他们又显然分化为“三大阵营”。

王小广、张立群：今年 GDP 增长率不会低于 7.5%

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6%。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博士说，二季度估计能达到 8%，预计上半年总体经济增长能达到 7.8%。

从投资方面看 他认为 今年是自 1998 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增长最强劲的一年。1-5 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 25.8%，5 月份当月为 23.9%。同时，外资增长比较快。1-5 月全国合同外资金额 278.6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29%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69.2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38%。

从出口来看 今年 1-5 月份全国出口增长 13.2% 超出去年年终

大家的估计，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同时，因政府出口退税工作做得比较及时 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出口积极性非常高。从这个趋势判断，全年出口增长率能保持 10% 以上。

但物价与消费增速下降了。1-5 月，消费增长与去年相比回落 1.7 个百分点 而 5 月份消费增长的回升是季节性因素所致。

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大块：一是外部增长因素及出口；二是内因性增长——民间投资及民间消费。王小广说，经济增长从长期看是靠外部因素及出口拉动，内因性增长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缺乏的。下半年 国债的投资力度要减弱一些 预计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的增长率会回落到 15% - 18%。并且，目前许多地方遭遇自然灾害等。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王小广仍然比较乐观，他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不会低于 7.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说 从投资来看 鉴于一季度全社会投资增长 19.6%，5 月当月增速也相当高，全年的增长速度要超过去年的 12.1% 但会低于一季度的增长，估计在 14% - 15%。

从消费来看,前5个月呈现增速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1-4月增长8.4%,5月当月增长9.3%与去年同期的增幅相比,今年有所下降。

从外贸出口来看,1-5月增长13.2%,5月当月达到18.4%。目前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利的是去年出口高开低走自5月份后增速有所下降,使得今年的同期基数低;不利方面出口退税力度加大的可能性比较小,由于总量固定,大部分额度在前5个月已基本用完。另外,尽管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明显,但至于未来会怎样,多数专家认为其恢复增长的势头在减弱,国际环境对后几个季度我国的外贸出口会产生影响。预计全年出口增幅比1-5月要低,比去年的6.8%要高,估计能达到10%。

张立群认为,从三项需求分析,增长都将比去年高。在此基础上,估计今年全年GDP增长在7.5%-8%之间,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达到8%的增幅是有可能的。

袁钢明:一些不好的信号应引起重视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认为,目前大家对经济形势出现好的势头都很兴奋,有人用“出乎预料的好”来形容,但这也使大家对经济生活中一些不好的信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消费需求下降、通货紧缩加重等问

题。

他说,我国目前是一个需求制约的经济发展特征,不是投资供给扩张所能解决问题的。在三项需求中,出口需求是由外部决定的,但只占我国GDP增长的20%,而净出口在需求增长中占的比重更是非常低,需求主要是由内需也就是投资和消费需求来决定的。目前,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不足。从数字上看,上半年投资增长比较高,但这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投资产生,不是由市场需求产生的,是外生的。5月份,以市场性投资为主的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大幅下滑,从上个月的26.2%下降到3.2%。

而作为市场内生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投资需求还要严重。袁钢明说,投资需求可以用财政投资来弥补,但消费需求不足就不好办。现在再想把消费需求拉动起来已经比较困难了,利息已经很低了,再降也没有效果;增加公务员工资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论;长假也无法再延长了。在目前经济的弱势中,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增长是首要的、原发的,如果消费需求上去了,就能拉动市场的投资需求,而财政投资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拉动是缺乏效率的。

就消费需求下降的原因,袁钢明的看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村的消费需求下降很快。今年农村消费需求占整个消费需求的34.7%,而在1997年将近50%,下降之快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但从今年一季度

的数字看，农民的收入增加了 7%，增长之快也是近年来没有的。收入增长了而支出却在减少，这只能有两种情况：农民的收入增长没有那么多；农民不愿意花钱。假设没有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前几年在城市出现的消费倾向下降在农村出现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未来支出的压力。据他调查，主要是上学和医疗两项支出的费用比原来高多了。

再说城市，城市消费倾向于下降，则说明，前两年鼓励消费的政策作用已经没了，不能维持像前几年 10% 多的消费增长了。

袁钢明说，经验表明，我国的消费增长在 10% 左右，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在 7% 左右。

朱明：全年 GDP 增长难以超过去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青年经济学者朱明说，总的来看，今年经济形势并不太乐观，全年 GDP 一直提出要达到 7% 的目标，政府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性很大，但要超过去年的 7.3% 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很大。在最近刚刚结束的联合国 LINK 会议上，联合国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1.8%，比去年增幅高 0.4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将温和复苏；IMF 预测结果也认为今

年世界经济增幅将稍高于去年，世界经济并未表现出一种趋势性的反转。

美国尽管在第一季度取得了 GDP 增长 5.8% 的较好成绩，但主要是靠政府大幅增加支出与企业回补库存来支撑，而这两项因素在未来不可能持久发挥作用。如果不计政府支出与企业存货增加的因素，高达 5.8% 的增长率将降低至仅有 1.3%。并且目前美国股票市场低迷，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不高，导致消费信心下降，消费支出减缓。美国政府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包括贸易赤字和失业率上升，企业投资依然没有启动迹象。因此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堪忧，美国经济要维持 3% 以上的 GDP 年增长率，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次，在世界经济没有根本性好转、甚至有可能重归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将面临较大困难。而中国加入 WTO 后，随着关税的逐步下降，一些科技含量高、互补性强的进口产品将会较短时间内迅速涌入我国市场。这样，我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甚至变为逆差，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减弱，国内经济增长对内需扩张的依赖性增强。

而从我国前四个月实际情况看，市场消费小幅下滑的趋势非常明显，市场价格也进一步回落，需求不足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预计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低

于去年。朱明认为，当前我国消费需求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这些深层次问题将长期制约我国的消费需求。除了收入增长较慢、预期支出大等原因之外，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已引起社会不满，成为当前制约我国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的国债投资，其边际效应也是逐步递减的，更何况财政部长项怀诚已经明确表态，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久实施。

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真的如期淡出，我国内需扩张的潜力将受到极大制约，经济列车将会有失去动力之忧，亟须货币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填补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留下的真空。随着国债投资项目的逐渐完工，国债投资的力度将有所下降，这将直接影响我国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带动我国投资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年前4个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41.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6%，但合同利用外资212.82亿美元，同比增长5.1%，增速有所减缓。由于中国的高成长阶段远未结束，潜力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和丰富的低成本人力资源等优势将长期存在，外商投资将继续大规模涌入，但合同利用外资的增速放慢预示着外资的流入将逐渐趋于平稳。

因此综合判断，今年全年消费需求将会比去年有小幅下调，投资

增速在下半年也将逐月回落，全年经济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增长和外资流入速度，这两者总体走势应该好于去年，能否有效抵消消费和投资回落的负面影响则很难说。朱明认为，全年GDP增幅高于7%应该问题不大，但要超过去年7.3%的增长率则有一定难度。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什么是政府信息公开

从宪法的角度来讲，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众知情权的重点内容之一。一方面是政务公开，政府办事制度、用人制度等方面的公开，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其所掌握的信息的公开。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有了解自己档案的权利，入住一个城市，有对周围自然环境、犯罪率高低等情况的知情需要；与一个公司签订合同，有通过工商部门查阅、了解该公司资信情况的要求，这些都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遗憾的是，我国绝大多数信息掌握在政府手中，公众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这些信息，信息成为行政机关甚至个人牟取私利的资源。

公民有权知道政府在干什么，政府在制定法规、做出决定之前应该听取公民的意见，实施行政行为应实行听证制度。我们目前应该强调的是政府对其所掌握的社会信息的公开，而不单纯是其政务的公开。

（摘自《信报》）

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

□朱文轶

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 1051.09 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 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 40.9 万元，判刑 15 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 1 万元，判刑 7 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 5.6 万元，判刑 5 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 24.3 万元，判刑 16 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一位高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说，李真之“大”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李真和他的前辈们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这位官员指出，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这样的“弄权”方式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与其说是个人的‘天才’，不如说是体制的缺陷。他认为这和李真的“年轻”是相符的，“年少得志给了他更大的胆量，仅此而已”。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被更广泛地注意。

秘书的权力来源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 岁的确是个槛，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 38 岁，而 4 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38 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 59 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两者相提并论，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

梁木生是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政治现象中“秘书部落”的学者之一。他提醒记者，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梁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

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梁灵光没有同意；“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直到梁调任广东省省长后黄杰才得到提拔。“现在就不一样了。”梁木生说；“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个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在这种相互选择中秘书与领导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

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

秘书角色与秘书部落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实不惟中国，国外也是如此。”另一位行政学研究者关钟叔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作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美国秘书的政治地位同样非常高。像汉密尔顿·乔丹，没有多少人敢去冒犯这位美国前总统秘书在‘白宫人物排列表’上他的名字甚至排在前国务卿万斯和前国防部长布朗的前面。”区别在于你是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角色，还是一种个人权力角色？”

“关于秘书的职务角色，曾有过4M的说法，是指秘书应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关钟叔认为，在权力个人化的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公务服务的职能逐渐向生活服务倾斜。”

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说时任北京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而闫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设”的机会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土特产去

看望王宝森 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不少的“家务事”后，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 闫从西藏返京 王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 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事能力”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 秘书角色的含义就变得很晦涩了。”关钟叔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 20 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然而 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 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身都把秘书视作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就像李真 即便后来担任省国税局长时也没有放弃‘河北第一秘’的角色。”关钟叔认为 秘书角色失范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权力分解的不合理、权力界限和权力责任的不明确以及权力监督目标的不确定，“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的双重失效使秘书腐败变得难以遏制”。

关钟叔在观察几起“秘书腐败案”时指出，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也就是说，

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能够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而秘书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同一官系中的秘书往往相互之间私交很深。”

“因此 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从这个角度上看，在反腐败案件里，‘秘书腐败’案极具标本价值。因为我们从‘秘书部落’的活动情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权力结构中权力具体运作的方式和脉络。”

失控的权力场

曾经有文章分析闫振利的腐败 说闫“钻了一个空子 人调到市政府工作 行政关系、党的关系却还留在市财政局”，“两边都管不着他”使闫“失去了监督”。

梁木生分析说，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 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梁木生认为，在这种失控的权力场中，秘书的作为让政治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人治色彩。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谁主亚洲沉浮？

——亚洲地缘经济中的竞争与合作

□庞中英

4月1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他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威胁”他是第一个这样说的日本首相，这与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相反。小泉这样说，在外交场合不刺激中国当然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小泉其实认为说“中国威胁”抬高了中国的地位，他不愿意面对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大国的现实。

小泉的话也是一个信号，日本将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个机会，将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更多的合作 中国、东盟、韩国、日本等可能一起建立一个亚洲自由贸易区。这将加强亚洲的吸引力与辐射力 与欧洲与美国平起平坐 世界有史以来将第一次在经济上三足鼎立。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所发出的“亚洲的声音”。

小泉的话同时也引出一个问题 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情况下，谁来主导亚洲地区经济？

中国与日本争夺地区 经济主导

显然，亚洲地缘经济中存在着

三个大国 美国、日本与中国。在这三大国中，美国靠的是超级经济大国地位与亚洲的军事存在发挥它的影响，而日本则靠在亚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东亚经济分工体系。

但是，美国与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并不确定，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来者，只是在最近才全面参与亚洲经济事务。但是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二大贸易国，仅次于日本，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第7位 年平均增长率在7.5%以上。中国将在未来10年继续沿着高速增长方向前进，成为亚洲经济的希望所在。

中国正在变成越来越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国市场。与当年大英帝国不一样，中国不是靠自我发育出来的产业向世界辐射，而是靠市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而成为“世界工场”的。

这样一个“世界工场”的重要意义就是自由贸易改造中国，以及变革中国与亚洲的关系。中国面临一次机会 即用经济影响力、儒家哲学与饮食方式的“软影响”而不是帝国的威望与尊严 更不是欧洲、西方

式样的船坚炮利来扩大自己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势力范围。

中国刚刚获得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为中国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在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个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了中国与亚洲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原来亚洲对中国可能不負責任、不受国际规则约束的担心将有所消除，在 WTO 的框架下，中国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扩展将具有合法性与规则的保障。

但是 衰退中的日本当局、产业界与战略家也在采取措施国防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线。2002 年 1 月，首次访问东南亚的日本首相小泉宣布日本与东南亚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框架 在博鳌亚洲论坛 小泉又说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日本仓促宣布这些对外经济计划，是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对中国在亚洲的经济攻势的被动反应。

吸引力与辐射力： 中日之间的经济竞争

中日之间在亚洲展开两种不同的经济布局。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是领飞亚洲雁阵的头雁，但金融危机宣告了这个国际分工体系的破产。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在亚洲扩展，没有成为日本设计的雁阵的雁尾，而是作为亚洲经济增长中心，参与亚洲地区经济体系。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现在

是个吸引力很大的经济磁盘。日本著名经营顾问大前研一教授认为：“在跨越国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时代出现了‘4C’的跨国界流动现象。所谓‘4C’，是指资本(Capital)、企业(Corporation)、消费者(Consumer)信息(Communication)。结果是，一些国家会有‘4C’大量涌入同时另一些国家又是‘4C’的逃离对象。前者会吸纳所有的资本和企业而获得发展 后者则出现衰退 成为依附于那些吸纳‘4C’大国的卫星国家。”中国经济现在确实在大量吸纳。东南亚国家感觉最明显，本来投资到东南亚的国际投资在金融危机后大量转向来到中国。台湾担心开放两岸三通而导致岛内经济进一步空洞化。日本业界也不断惊呼中国发展太快的“中国冲击论”大前研一教授说：“非常遗憾的是 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日本将不得不沦为后者。”

除了强大的吸引力，一个经济大国要成功还必须要有强大的辐射力。但中国的经济辐射力还不强。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 20 多年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建立在一种依赖外需的结构基础上，即经济增长主要靠外贸与外资推动。同时，作为价值增值链产业的高效服务业落后。在地区发展方面，多数中国地区还没有做到经济独立与地方自治，半壁江山的中西部广大腹地仍然高度欠发展。国家的教育体系也不能培养出具有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人才，

知识和技术缺少原创性，中国还不能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生产体系与服务体系并辐射亚洲与世界。

中国改变地缘经济格局

亚欧大陆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而中国又处在亚洲大陆的中心。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法认为阿富汗、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昂格鲁—萨克逊战略观念。从亚洲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中国才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如果中国四面出击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网络，世界经济与地缘战略格局必将发生大变化。

东亚国家是中国东部的周边，从长远看，整个东亚地区都具备逐步走向贸易自由化的基础和发展前景。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合作将是我国今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目标。中国十分重视与东亚地区的合作。最近 3 年，中国领导人先后成功地出席了东盟和中日韩三国 (10 + 3) 以及东盟和中国 (10 + 1) 领导人之间的 5 次会晤。在第三次 10 + 3 会晤期间，各国领导人确定了加强在经贸、金融、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文化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这些努力从政治上进一步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在中国西部，同样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地区经济合作。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并适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 实现降低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成本的目的，中国已经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还高度重视亚洲—欧洲合作。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实际上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占据亚洲区位优势的中国如果继续根据全球接受的自由贸易原则四面出击，日本必然感到长期的中国威胁，甚至与中国出现“战略紧张”。

总之，虽然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存在着战略紧张 但是 目前的亚洲地缘经济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需要不失时机地扩大在亚洲的经济影响，铸造以经济内容为主的中国与亚洲新关系。

亚洲“美好轴心”： 中国不是威胁

中国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亚洲的经济政策）应该主要由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战略利益来主导。亚洲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基础，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依托，中国必须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推动亚洲经济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落实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的承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就在美国布什统治集团炮制所

中国“三农”问题出路在哪？

□李卫玲

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浪一起，绿洲也会随着倾覆

近期国外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崩溃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崩溃就从农业开始。不管这些论调是否有

足够的根据，但农业、农村、农民习称为“三农”的问题，的确引起很多人士的忧虑。

谓“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时，我们东亚的新加坡人却认为世界存在着一个“美好轴心”(Axis of Virtue)。这一说法在国内还没有给予重视。2002年3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地区研讨会(有来自东亚主要国家的学者与业界人士参加的高层聚会上，新加坡巡回大使负责自由贸易区问题)著名学者许通美教授与众不同地提出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一起组成一个亚洲“美好轴心”，推动这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常常站在平等的立场同欧洲讨价还价。他还说，中国的高经济成长率可能使它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可惜，单独日本或者中国都不可能与欧洲与美国竞争。所以，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尽管存在竞争关系，相互视作威胁，但面对欧洲与美国，亚洲各国如果在经济上不合作，其竞争力与利益就将被各个击破。

从理论上讲，5亿人口的东盟是个自由贸易区、拥有共同的电子产业基地，其综合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的2/3。如果日本、中国和东盟密切三方的经济关系，最终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组成共同市场，对三方都有利。

中日的竞争与合作决定着亚洲的经济命运。中日之间不竞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竞争中坚持合作将改变整个亚洲的风气。两国都要从战略高度加强合作，因为没有中日的合作就没有与欧美平行的亚洲。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说，美国不是经济的单一大国，它必须

(庞中英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博士、知名亚洲问题专家 学术考察足迹遍及亚洲各地，目前在清华大学主持“中国与亚洲关系”研究项目)

(摘自《南风窗》)

有看法说 中国的“三农”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 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 大海风浪一起 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6月3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的“三农”问题现在的确非常严重 农民收入增长停滞 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但中国的农业绝对不会崩溃 加入世贸组织 对中国农业是机会大于挑战。

林毅夫认为，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首先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就要通过解决城市通货紧缩的势头，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

有人认为 中国“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进入90年代以来，8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活跃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与80年代的情形相比 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反差。

对此 林毅夫说 也不能这样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 和各个不同的阶段有关系。但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很大，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农民收入增长很快 农民的积极性一次性释放。但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快主要靠劳动动力转移。如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农民工的出现。但1997年以后，这种现象发生了逆转，生产力普遍过剩。城市企业开工不足，面临城市产品的普遍过剩，乡镇企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很多都破产。

因此，就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去 同时造成村、镇、乡普遍高负债。二是农产品生产很多。农产品太多，价格就会降低。增产不增收，劳动力转移又不可能。所以，就造成农民收入停滞，城乡差距更扩大的情形。

现在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林毅夫说，1978年至1984年，是农民一次性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到80年代中期后 城乡差距扩大。当时，虽然劳动力开始往外转移，但当时对农村比较有优势的农产品，比如粮食和棉花的价格还是人为控制。东部在发展，对粮食和棉花需求多，但那些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象这样的情景，实际上是农村在补贴城市的发展，中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越发展 城市越发展 从农村拿的补贴越多，差距就越大。

加入WTO后 粮食和棉花等的价格会放开 东部和城市需求多 价

格就上涨。这样，东部和城市发展会拉动中西部和农村的发展动力，农民收入会增加。随着加入 WTO 后的市场化进程，城乡差距很大的问题会得到缓解。

农村剩余劳力如何转移？

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先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林毅夫说，要通过解决城市通货紧缩的势头，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来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林毅夫说，解决通货紧缩，靠解决存量需求。因为生产能力过剩是一个存量概念。它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能力，是由于政策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需求不能出现。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是转型中国家，属于双重的二元经济，有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有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过去，为保护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有很多限制，民营企业有很多积极投资意愿，但不能投资。

如果能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可以释放出来。农村里有很大消费需求，但农村里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相当严重不足，造成限制农民消费。如果能改进的话，农村的消费就能释放出来，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不仅如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农民收入就可能增加。

有研究认为，如果把几个大都

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

林毅夫说，中央财政过去支持大项目的，现在可以转成和农村生活有关的小项目。他前段时间提出新农村运动，指出小项目的投资既能启动农民的消费，而且实际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小项目所用的材料和劳动力都是当地的。

林毅夫认为，要减少农民，就要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按照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加入 WTO 后，政府扶持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机会就降低了。如果政府不能进行干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发展得比较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就会缩小。

依靠中小企业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林毅夫说，中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中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和谈条件太苛刻”

——专访奥斯陆协议设计师贝林

□钟翠花

4月9日，记者在特拉维夫和平路4号采访了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设计师、以色列前司法部长约西·贝林。当天，恰好是犹太人遭大屠杀纪念日，也是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城镇的高峰时刻。

记者：以军侵入约旦河西岸巴控城市，您的心情怎样？

贝林：我感到非常伤心和沉重。我们好像回到了不应该回到的

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90年代以后，中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小，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实行行

时代。以色列离开那些巴勒斯坦城镇是前总理拉宾取得的最大成就。这些城镇对我们来说是禁地，回到那里让我感到这贻误了机遇。

以境内发生恐怖袭击后，民众普遍要求做些事情。但问题是该做什么。报复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却不是应对恐怖主义的最好办法。认为重占巴控城市、捣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从而结束恐怖主义的想法

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

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会产生众多的不良资产。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中小银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摘自《国际金融报》）

是有问题的。军事打击能一时降低暴力水平，但真正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人们心里。现在双方复仇感很强，恢复和谈很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和谈，双方领导人应该想方设法回到谈判桌上。

记者：您如何评价沙龙的政策？他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在付诸实施？

贝林：沙龙反对奥斯陆协议。我认为他上台时就认为自己的作用在于摧毁巴民族权力机构，并希望让更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取而代之。如果我没错的话，沙龙不相信能按两国模式实现和平。

记者：沙龙是否实现了目标？

贝林：沙龙为和谈设置了苛刻的前提条件，同时使工党陷入其政策圈套。沙龙在极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由于局势恶化到战争状态，工党才发现自己难以从沙龙政府中脱身。工党主席、国防部长本·埃利泽说，在战争中离开政府就是背叛，但工党陷入的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记者：沙龙会驱逐阿拉法特吗？

贝林：如果沙龙驱逐阿拉法特，必将铸成大错。如果阿拉法特遭到孤立或驱逐，不会有任何巴勒斯坦人会代替他同以色列进行认真谈判。到头来，我们必须讨好阿拉法特，请他和我们谈判。

记者：您如何评价沙龙对阿拉法特采取的措施？

贝林：沙龙通过政府决议宣布阿拉法特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无关”的人，这有些幼稚。你可以决定杀害或会晤某人，但你不能通过决议宣布他“无关”。在决定阿拉法特“无关”的同时，沙龙恰恰证明了阿拉法特不是无关的人。沙龙不仅没有孤立成阿拉法特，反倒使以色列陷入孤立，致使世界范围内批评以色列和沙龙政策的声音空前高涨。因此，沙龙必须承认，不管他是否喜欢阿拉法特，阿拉法特都是巴勒斯坦的领导人。而忽视他的存在将使以色列付出很高的代价。

记者：您如何评价阿拉法特？

贝林：阿拉法特是个复杂的人。1974年，阿拉法特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橄榄枝。他仍同时拥有这两种工具。在奥斯陆期间，阿拉法特把枪放在了一边，在过去一年半里，他又把橄榄枝放在了一边。阿拉法特仍然希望做巴勒斯坦国的总统，如果他能够得到耶路撒冷及其中的伊斯兰圣地，那他就会成为和平伙伴。如果他认为没有希望实现目标，就会成为所谓的“自由战士”。即使他知道以色列军事力量强大，战胜以色列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仍视自己为“烈士”。阿拉法特有两面性并不是独特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两面性。如果巴勒斯坦人视他为自己的领导人，我们却说他不是，只表明我们没有准备好同巴勒斯坦人谈判。

记者：您个人认为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议上错过了历史机遇吗？

贝林：我不认为他在戴维营会谈中错过了历史机遇。戴维营会谈后，和平仍在继续。我们在塔巴会谈（2001年1月）中接近达成协议。如果沙龙（2000年9月访圣殿山后没有爆发巴勒斯坦起义，或者起义被立即平息下去，我相信我们现在与巴勒斯坦人就已经实现和平了。克林顿执政最后几个月中的谈判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而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起义。这当然使我们错过了机遇，但我们都犯了错误，包括克林顿和巴拉克。

记者：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很多以色列人对奥斯陆和平协议非常恼火，因为它使巴勒斯坦人可更近距离地向以色列人开火”。

贝林：奥斯陆协议是戴维营协议的合法产儿，以巴和平协议的框架那时已基本确立。奥斯陆协议让巴方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地方警察，能落实协议，我们给他们提供武器。但像现在这样，这些武器掉过头来打以色列，确实糟糕透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再给他们提供武器，而应该创造一种不利于使用这些武器的环境。我们同样不应该放弃让巴勒斯坦人最终获得他们的土地，成为我们好邻居的想法。

奥斯陆协议的错误之一是巴勒斯坦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切实的成果，他们人均收入和预期寿命下降，看不到政治解决问题的希望。与此

同时，以色列不断扩建定居点，更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我总感觉时间对我们这些为和平努力的人不利，因为定居点建得越多，双方仇恨越深，越难实现和平。再过8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受以色列控制的阿拉伯人口数量将超过犹太人的数量。在人口比例上，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以色列迫切需要一个边界。

记者：一谈到土地问题，以色列内部的阻力就非常大了。另外，现在左翼力量受到削弱，对和平更不利。您对此如何评价？

贝林：以色列内部大多数人赞同基本回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边界。当然，定居者会反对，但他们只是少数人。以色列的民意像钟摆，1992年大选前，民意测验显示，沙米尔十拿九稳要继续做总理；1999年巴拉克当选前，似乎人人都说内塔尼亚胡的总理要当到底。现在，以色列有种相互支持战争的气氛。一旦大家认识到（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时，就会考虑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出路就是回到谈判桌旁。相信钟摆可能会摆到我们一侧。

记者：您怎样评价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

贝林：布什政府一直力图与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起初认为不介入中东问题有利于美国利益，后来又改变了立场，决定重新介入。我早就指出，等中东起火后，

他们会最终返回。只是等美国决定派人来的时候，恐怕会为时已晚。目前就是这种情形。

记者：今天是犹太人遭大屠杀纪念日。以色列人从大屠杀中汲取了两种教训：一种观点是世界虐待过我们，我们凭什么要对别人好？另一种观点是，既然我们遭受过这种灾难，我们就不能让别人遭受不幸了。您怎么看？

贝林：我认为人性中有善恶两部分。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能够释放出人性恶的一面，而领导人的智慧就是要扬善。一个集体很容易做出疯狂的行为，就像人们在观看足球赛时的失态表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为这种现象付出了最高代价 因此 我们也在致力于如何防止不同程度的此类事情发生。

记者：现在很多以色列人问，我们怎么能够与“这样的人”实现和平？

贝林：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人的问题。犹太人遭大屠杀后没几年，以色列与德国签定了和约。为什么，他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不认为有什么人你无法与他们实现和平。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妥协。你如果知道你的“红线”并确保他们得到尊重，那么你就能够与任何人达成协议。

记者：有人说，您恐怕是以色列剩下的头脑最冷静的人了。

贝林：我不这么认为。（以色列）属于左翼、鸽派的人很多 大约

占民意 30%。这些人认为 我们要么应该达成协议，要么单方面采取措施，尽快在以巴之间建立边界。用武力，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个人认为 应该先达成协议 再树立界墙，至于树立什么样的界墙是次要的。应该帮助巴民族权力机构重新在安全等方面巩固地位，然后与其就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首先 应该达成停火协议 确保他们落实停火。我认为他们现在无法签署协议。因为我们捣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如果现在他们与我们签署了和平协议 我也不会当真。现在 至少在约旦河西岸没有真正的权力机构了。

（摘自《环球》）

红色食品有益健康

如今人们对绿色蔬菜和水果的好处耳熟能详。但营养学家认为，红色食品对身体的好处一点儿也不逊色。

营养学家对西红柿的组成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其果肉中所含的大量番茄红素能够降低口腔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的发病率 同时对心脏功能的维护也有很大的帮助。红酒、红辣椒、草莓、樱桃、苹果、西红柿等红色食品中的维生素含量与绿色食品相比高出许多，而且红色蔬菜也是美容美颜的佳品。

（摘自《大众科技报》）